

# 中国



# 皇帝皇后



# 全传

成思远/主编

远方出版社



#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

## 光绪

成思远 主编

远方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/成思远主编.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06. 11

ISBN 7-80723-146-7

I. 中… II. 成… III. ①皇帝—列传—中国  
②皇后—列传—中国 IV. K827=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9581 号

##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

---

主 编: 成思远

出版发行: 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 01001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4600 千字

印 张: 518.5

版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2000 套

标准书号: ISBN 7-80723-146-7/I·46

---

定 价: 2580.00 元(全 100 册)

# 目 录



|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|
| 第一章 | 归政之争 ..... | (1)  |
| 第二章 | 甲午风云 ..... | (44) |



## 第一章 归政之争

光  
绪

漫长而又无限的期待终于即将变成了现实，自己呕心沥血十几年的“学生”已经叩开了“亲政”的大门。光绪既希望这一天的早日到来，又唯恐这一天的到来会发生什么。

按中国古代宫廷的惯例，皇帝十四岁就应该亲裁大政。如按清王朝的不成文例，清朝定鼎中原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帝六岁登极，十四岁亲政；第二个皇帝康熙帝八岁登极，也是十四岁亲政。此后诸帝直到咸丰帝，继位时皆非幼主，故无所谓亲政之说。然而到了同治帝，正像清朝本无“母后垂帘”而仍行“垂帘听政”一样，什么“惯例”、“祖制”均不在西太后话下。除了因同治帝“学识俱劣”与令人失望的客观实情之外，西太后迟迟不欲交权撤帘。直到同治帝十六岁（同治十二年）正月，她才让同治正式亲政。

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，光绪帝十四岁了，虽有同治帝时创下的“新例”，但亲政的问题并未有人敢于提及，西太后独自操权的欲望早已被大小臣工洞悉而心照不宣。无形之中，人们只好把光绪帝十六岁当作希望来等待了。现在光绪帝真到了十六岁，诸王亲贵、枢机群臣，甚至西太后本人也不得不承认，无论按礼法、祖制，还是光绪帝的“学识德业”，似乎都再也没有继续搪塞的理由。

时间在向西太后的权力欲挑战。

早在十二年前，西太后即无视清朝“家法”，强立载湉为



帝。为平息舆论，笼络人心，曾公开作出了待光绪帝生子再为同治帝立嗣和“一俟皇帝（光绪帝）曲学有成，即行归政”等两条保证。十余年过去了，西太后兑现诺言的日子日益迫近。尽管第一条因光绪帝尚未大婚，为同治帝立嗣自然可暂且不提；然而向光绪帝归政一事，虽然她心里是百般不愿，可到底已是事到临头。然而，慈禧在光绪“亲政”前却早已做好了人事安排。

在军机大换班，罢免恭王的时候，西太后便在自己身边安插了第一批亲信，包括醇亲王奕譞。

原来，奕譞对西太后一直心怀畏惧。光绪帝典学期间，他怕引起西太后猜忌，尽力加以回避，很少到书房去“训戒”儿子。但他并不是真的对政治不感光趣。奕譞的那些“自警”名句、格言，不过主要是给人看的“韬晦”之计，用其掩人耳目罢了。当光绪七年（1881年）东太后暴崩后，奕訢失去了有力的支持者，并且他又看到西太后对奕訢的不满日渐明显，于是奕譞便跃跃欲试，据李慈铭日记载，就在军机换班的前数日，（西太后）“幸九公主府赐奠，召见醇邸，奏对甚久。”翁同龢也记有：“昨日，皇太后在公主府传膳，醇王进，还宫酉初二刻矣”。“十二日，军机起，一刻，万培因、孙毓汶、乌拉布、醇王、师曾，凡五起，而前日封事总未下，必有故也。”看起来，奕訢之被逐与奕譞的作用是不言而喻之事。故奕譞自“易枢”始便成为后党的首领、清廷的显贵。如果说，在此之前，奕譞还一直因西太后强立其子为帝而产生的受宠若惊之余悸未消，那么，到此他已冷静下来完全站在西太后的政治风船上了。

不过，毕竟由于醇亲王奕譞的身份特殊，以免造成更大震动，所以西太后还未便把他安置在更为显著的前场，而是将军机首席的位置交给了礼亲王世铎。但虽如此，奕譞在清廷中枢的作用仍是举足轻重的。当然，礼亲王世铎也是西太后信得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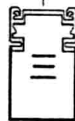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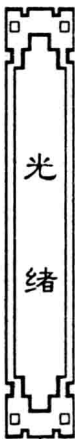
的后党第二号人物。

礼亲王者，清初八王之一，世袭罔替者也。世铎袭爵，当咸丰中，以行辈高，令掌宗人府。同治初，以承志袭郑亲王爵，载敦袭怡亲王爵，皆以旁宗入继。铎持之，各致贿万金，乃报可，京师人形诸歌咏。然接人谦穆，终身无疾言厉色。对内侍尤恭谨。李莲英向之屈膝，亦屈膝报之。诸王以敌体仪报诸奄，前此所未有也。甲申，奕訢罢政，遂令预机务，而以奕譞家居，遥总其成。铎日走所取进止，不以仆仆为苦。而益务求贿，贐二百金者以门弟子畜之，杀至五十金，亦可乞其荐牍，达诸疆吏。时有‘非礼不动’之嘲，言非礼物不受嘱托也。……

可见，慈禧之所以命礼王领枢，一是利用他的爵峙班高，可以作为名义上的领袖，二是利用他的易于驱使。若是换了别人，未必就肯以领枢亲王之峙，仆仆奔走于醇亲王府邸，事事恭候奕訢之裁定了。

新枢府中惟有阎敬铭小有“清介”之名。他之所以被西太后看中，主要是因其当上户部尚书，即查出户部积存历年查抄罪臣之家的几百万两银子未入账。这些银子，历来均被用于顶替亏空账目并易于中饱私囊。正是这一“功劳”，赢得了西太后的欢心。当然还有他的忠顺和唯命是从。

张之万、额勒和布、孙毓汶和许庚身有共同特点：见风使舵，阿谀逢迎。张之万虽为状元出身，却除“作画颇有家法”外“一无所长”。而额勒和布是“木讷寡言”，其能力不过是“同列渐揽权纳贿，独廉洁自守，时颇称之”。许庚身“以应对敏练，太后亦信仗之”。其人才不见长，“贪财好货”则并不逊色。至于孙毓汶，因其父曾为醇王教读，故“以习于醇亲王，渐与闻机要”，他入枢府后，“最为眷遇”，并不是因为其勤谨持正，反例是由于他“权奇饶智略，尤有口给。初颇





励操行，及入枢府，顿改节，孜孜营财贿，通竿牍。……时称齐天大圣，言如小说中孙悟空之善变化”。

清代由军机大臣组成的军机处，是秉承皇帝旨意：“军国大计，罔不总揽”的最高机要班子。但当光绪帝即将亲政之时，连同他的老师在内，都一股脑儿地被西太后逐出，换上了一伙“贪劣无能”，既无人品，又少威望；既不谙国内政情，更昧于国际事务的“盲叟”。显然，这个军机处不是为光绪帝准备的，而是西太后营私的核心。

不过，慈禧也遇到了一些“反对者”。

还在光绪初年，在清王朝内外交困的政局和权力之争的激烈进行中，清政府中便出现了一批官品低、无实权，“却直言敢谏”的御史或翰林。他们遇事不避厉害，“力排众议，侃侃直争。”尽管其中不无“沽名钓誉”者，确也使朝廷中一些妄行独断者有所顾忌，一些贪墨庸劣之臣被劾罢斥。声名较著者被称为“四谏”、“十朋”：这其中有张之洞、张佩纶、宝廷、陈宝琛、黄体芳、张观淮、吴大澂、刘恩溥、吴可读、邓承修等。吴可读的尸谏曾给西太后添了很大麻烦；盛昱的弹章却给她提供了口实。可无论如何，清流已“久为西朝（西太后）所不满”。暗觊西太后的意图，孙毓汶等将吴大澂、陈宝琛等排挤出朝；把赵尔巽、邓承修等外放贵州、广西。至此，不但再无人敢于掣肘西太后的一意孤行，连胆敢微词置辩者也几乎绝迹于朝了。

排斥异己的计划完成后，见风使舵者不再发表“高论”，趋炎附势者反而越来越多，慈禧的“班底”在不断壮大。后来又相继进入军机处的庆亲王奕劻、吏部尚书徐桐等，也都成为了她的骨干。

当然，慈禧太后的人事安排不仅限于清中央政府，地方的高官显宦也在其列。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就是李鸿章。

当时在清朝统治层中疾视李鸿章的，主要是帝党官僚，时





翁同龢“当国，尤百计齟齬之”。翁、李矛盾，不仅涉及政见之争，而且还含有私怨成分。1862年翁的哥哥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内被曾国藩上疏严劾，受到远戍新疆的惩处，据说曾氏的上疏，就是由李鸿章立稿的，出语惊人，无懈可击。翁同龢怀恨在心，他以帝师之尊而为枢府大员后，便借机压制李鸿章，因而李鸿章“怨之颇切”。翁同龢虽然位尊权重，但却一直未能入阁拜相。因当时无缺可补，他便产生了觊觎李鸿章缺位的想法。袁世凯投其所好，甘愿为翁氏火中取栗，袁世凯是个“小人”，起初追随李鸿章往上爬，及至李鸿章失势，就立即改换门庭，竭力攀援李鸿藻、翁同龢、荣禄等达官显贵，以为进身之阶。一天，袁世凯登门拜访李鸿章，稍作寒暄之后，就开门见山地说：

中堂再造元勋，功高汗马。而现在朝廷待遇，如此凉薄，以首辅空名，随班朝请，迹同旅寄，殊未免过于不合。不如暂时告归，养望林下，俟朝廷一旦有事，闻鼓鼙而思将帅，不能不倚重老臣。届时羽檄征驰，安车就道，方足见老成声价耳。

李鸿章越听越生气，未等袁世凯把话讲完，就大声喝止，痛加训斥说：

朝廷，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？他汲汲要想得协办，我开了缺，以次推升，腾出一个协办，他即可安然顶补。你告诉他，教他休想！旁人要是开缺，他得了协办，那是不干我事。他想补我的缺，万万不能！武侯言‘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’，这两句话我也还配说。我一息尚存，决不无故告退，决不奏请开缺。臣子对君上，宁有何种计较？何为合与不合？此等巧语，休在我前卖弄，我不受尔愚也。

袁世凯碰了钉子，“只得俯首谢过，诺诺而退”。袁世凯走后，李鸿章还余怒未消，特向亲信幕僚倾吐心声：



袁世凯，尔不知耶？这真是小人！他巴结翁叔平，来为他作说客，说得天花乱坠，要我乞休开缺，为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。我偏不告退，教他想死！我老师的‘挺经’，正用得着，我是要传他衣钵的。我决计与他挺着，看他们如何摆布？我当面训斥他，免得再啰唆。我混了数十年，何事不曾经验，乃受彼等捉弄耶？

翁同龢有意把李鸿章赶出北京，以便“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”，但结果以失败而告终。李鸿章所以未被“放归田里”，主观上得益于曾国藩的“秘传心法”——“挺经”，绝不奏请开缺休致；客观上则凭借于权势者们支持，慈禧、奕訢“眷念鸿章旧劳，始终欲保全之”。

李鸿章虽被投闲置散，但每目击时势，既为自己洋务事业的破产而抚膺叹息，又因无法挽救清廷的危亡而忧心忡忡。他对自己“一生事业”进行了反思，似乎有意借鉴历史经验探寻出路。他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慨叹：“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惊，此中苦况，将向何处宣说？”他环顾左右，终于选定吴永作为宣说的对象。吴永是曾国藩孙女婿，时在李幕，被李鸿章“以通家子弟相待”，“晨夕左右，几逾一载”。李鸿章经常与吴永枯坐庭院，“随意谈论”。他说：

我办了一辈子的事，练兵也，海军也，都是纸糊的老虎，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？不过勉强涂饰，虚有其表，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。如一间破屋，由裱糊匠东补西贴，居然成一净室，虽明知为纸片糊裱，然究竟不知里面是何等材料，即有小小风雨，打成几个窟窿，随时补葺，亦可支吾对付。乃必欲爽手扯破，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，何种改造方式，自然真相破露，不可收拾，但裱糊匠又何能负其责？

原来被引以为自豪的北洋海陆军，在甲午战争中一触即溃的严酷现实，使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办之事，“练兵



也，海军也，都是纸糊的老虎”，“虚有其表”，外强中干。这种不幸结局，导源于“内外牵掣”，不能“放手办理”。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作“破屋”，及至“破屋”“真相破露，不可收拾”，怎好不从“破屋”本身寻找原因，反而归咎于“裱糊匠”呢！

曾国藩生前曾批评李鸿章“做官做到底”“要官不要脸”的“挺劲”，李鸿章不以为然。李鸿章对那些“遇事弹纠，放言高论”的“言官”，深恶痛绝，每当说及，即“以足顿地，若犹有余怒者。”他认为“言官制度，最是坏事”，明朝之亡，就亡于言官。言官都是“少年新进”，不通世故，也“不考究事实得失，国家利害，但随便寻个题目，信口开河，畅发一篇议论，藉此以出露头角，而国家大事，已为之阻挠不少。”现在办事，举步维艰，动辄得咎，大臣本不敢轻言建树，但责任所在，又不能坐以待毙，常常苦心孤诣，想出“一条线路，稍有几分希望，千盘百折，甫将集事”，言官以为有机可乘，就群起而攻之。“朝廷以言路所以，又不能不示加容纳，往往半途中梗，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。大臣皆安位取容，苟求无事，国家前途，宁复有进步之可冀？”

李鸿章评击“言官”并不是偶然的，他与其他同僚相比，被“言官”“弹纠”的最多、最厉害，有的甚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。他认为自己所倡导的“和戎”与“变法”之所以难于奏效，“言官”的阻挠破坏是一个重要因素。“言官”问题，关键不在于个人，而在于制度。当然他全盘否定“言官制度”，意气多于冷静分析，不肯反躬自省，而一味委过于人。“言官”虽有“捭拾浮词”、“肆口妄言”、“党同伐异”、“受人请托”等等弊端，但也不乏深切时政从实直陈者，对纠正失谬颇有裨益。

李鸿章曾批评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，公开为恋栈苟安、争权夺势的思想行径辩解。他说：“今人多讳言‘热中’



二字，予独不然。即予目前，便是非常热中。仕则慕君，士人以身许国，上致下泽，事业经济，皆非得君不可。予今不得于君，安能不热中耶？”这表明李鸿章并不甘心久居散地，热中于争取清廷的信任，东山再起，重游宦海。正如时人所说的：“李鸿章叠经参劾之后，入居清近之任，不思引退，常恨失权，图度数月”。

翁同龢对权力不能说不热衷，尤其是“学生”长大，即将“亲政”，他也应该将自己的抱负施展开，以便君臣配合。

中央、地方之外，慈禧身边的“体己”就是大太监李莲英了。而李莲英入宫得宠，得益于他的“梳头术”。

慈禧是个爱美的皇太后。入宫之始，她长得貌美超凡，固然是被风流天子选为贵人的原因，但淡妆浓抹，巧于打扮，才是她得宠的真谛。然而，她早年得宠，地位并不高。宫中主位，上有皇后、皇贵妃、贵妃、妃、嫔等位次，慈禧仅居贵人位次，比答应、常在略高两位。咸丰末年才被晋封为皇贵妃，位居皇后以下。辛酉政变成功，载淳做了小皇帝，他便母以子贵，一跃而被尊为圣母皇太后，和慈安皇太后并列垂帘听政，实际是由她独揽大权。由于位尊身贵，爱美的要求越来越高了。满洲贵妇爱美，首先是重视发型之美。特别是慈禧皇太后，尤为讲究头上的功夫，梳头打髻，花样翻新，插玉戴簪，价值千金，以为美丽高贵。因此，宫中设有梳头房，是专为后妃主位梳头的机构。

宫中究竟有多少贵妇，还专设梳头房机构？清宫则例：皇帝有皇后一人，统辖六宫，皇贵妃二人，贵妃四人，妃八人，嫔、贵人、常在、答应以下无定数。古来传说，每个皇帝都是“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嫔”，其实这也不是后宫的固定建制。我国历代皇帝，都是至高无上，位极人臣，享有圣龙天子的最高权力，可以为所欲为，独断专行。实际上皇帝后妃多得无数。梳头房给众多后妃们梳头是忙不过来的，所以，内务府规定只



光

绪

九

给妃、贵妃、皇贵妃和皇后们梳头。即使是如此，每个主位按两三个梳头太监计算，梳头房太监也需要几十名太监，算得上是一个庞大的机构。慈禧位居贵人、嫔位时，梳头房不管她的梳头的差事，由手下宫女给她梳头，好坏都能将就点儿。自从做了妃和贵妃之后，梳头房太监也把她的梳头差事统一包下来了，虽然对梳头太监多有刁难，但打骂处罚并不多见。自从做了皇太后之后，因宫中一切人都畏于贵妃位高权大，她的要求便越来越高了。垂帘之始，这位年轻的寡妇年仅二十七岁，爱美之心正盛，垂帘听政之暇，春心大动，每天仅用于梳头的时间就不少于一两个钟点儿，把自己打扮得如同仙女一般。

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，慈禧的爱美之心有增无减，对梳头发型要求越来越高。给慈禧梳头的太监不知换过几茬，但没有一个称心如意的。只好又换一拨梳头太监，并专门让李莲英在身旁监视。

据传，慈禧是后妃中的第一长发贵妇人。这样长的头发，梳起来很难，而太后脾气又怪，不准梳掉一根头发。但是，这样长的头发，梳头不掉头发更难，以往的梳头太监，是个老手，偶尔梳掉一根头发，能施动幻术，偷偷藏起来。只有一次被慈禧从镜中发现，当场杖责发落。从此以后，为防止梳头掉发，每次梳头，总是命两个太监在两侧监视。这次李莲英有幸，竟成了监视梳头的发官。

狡诈多谋的李莲英，早就知道西太后经常调换梳头太监，确实也没有找到一个称心如意者，为了得宠于西太后，他经常遍游南城的大小妓寮密集的地方，常常是百顺胡同、韩家潭巷、石头胡同、王广福斜街、东皮条营等清音小班的坐上之客，反复观察姑娘们梳头，有时还亲自动手为姑娘们梳头挽髻，得到姑娘们的赞誉。

李莲英为了学梳头术，还常跑南城大森林、小李纱帽胡同、朱茅胡同、朱家胡同、燕家胡同、青风巷、庆云巷、王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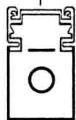


胡同等茶馆酒肆，观看发型。有时，还到四圣庙、双五道庙、莲花河、赵锥子胡同、前后营、赵阴阳胡同等下处，细看梳头要领，刻意揣摩，终于掌握了各种发型密决。

不久，李莲英被擢为梳头房总管太监，位居六品。这是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的事，两年之后，赏四品顶戴。

光绪七年十月（1881年11月），李莲英居然奉恩赏三品顶戴花翎，是以打破四品的最高限制，其地位已基本上与敬事房太监大总管李双喜平起平坐了（时李双喜也为三品花翎）。那时，东太后死去未久，西太后独坐朝堂，为了解“公私动静”，便把对她终日侍奉左右、极尽谄媚、阿谀之能事的李莲英大加封赏，直到将其提为整个清宫的太监大总管。从而，李也日假“后权”以肆虐，“渐著声势”。的确，在光绪帝“亲政”前后的几年之中，内自军机处至督抚等大员，甚至光绪皇帝，在他面前都要矮三分。进而又造成一种奇特的情形：如果谁能买通李莲英，也就等于交通了西太后。如原来作为一个远支宗室、爵位颇低的辅国将军奕劻，因为在李莲英那里花上了银子，便得到了西太后的赏识，一再加官晋爵，逐步晋升为亲王，官职做到总理衙门大臣，成为后党的骨干。通过逢迎西太后，被提拔为工部尚书的荣禄，初因其不轨遭到处分，后来也由于他“肯在总管太监李莲英跟前花银子”，逐渐“改变”了西太后对他的看法，又步入青云。到光绪帝“亲政”之后，荣禄亦成为后党的中坚，西太后的头号大红人。此外，甚至醇亲王奕譞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等，都要对李莲英敬三分。至于那些一般的官小位卑者，恐怕连巴结都没有机会。

随着光绪帝亲政时日的迫近，西太后对皇帝的防范心理亦日重。因此，依靠李莲英以坐视光绪帝的言行举止，便成了她要求李莲英的一项重要任务。而李莲英真也不辱使命。既然西太后并不真想让光绪帝亲操权柄，这个神经特别敏感的太监便经常在“孝钦前短德宗”。甚至李莲英还挑拨离间以讨西太后





的好，“言皇上有怨望之心”。如果说这还是背后捣鬼，那么有时他也依仗西太后的淫威“陵蔑皇上，当然，在光绪帝“亲政”后的岁月中，凡有关帝、后之间的纷争，几乎无不有李莲英的黑影。

## 二

随着光绪帝年龄的增长，他的大婚、亲政逐渐迫近，西太后撤帘、归政已不可避免了。因此，西太后不得不改变一下控制清廷的方式，考虑自己的“退路”了。她费尽心机通过“甲申易枢”排除异己、笼络亲信，已在人事上作了“预备地步”的安排，接着，她又为其自身思考应变举措了。

原于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秋，英法侵华联军掠劫并焚毁了供清皇室享乐的圆明园。次年，西太后自避暑山庄回銮，刚刚经过亡夫之痛，又一门心思在“垂帘听政”，亟亟于抡权之争，似乎还没来得及想到园林之乐。但当“辛酉政变”成功后，到了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，西太后表示要撤帘时，当时的同治帝或是真要孝敬母后；或是急于将视权如命的母后支出宫廷，便大力倡导重修圆明园。结果因“经费支拙”，并遭到奕訢、奕譞等亲贵重臣的一致反对而作罢。但随后，同治帝又提出暂修三海工程。至此，虽然群臣不敢再上言谏阻，可兴工不久，同治帝一命呜呼。当小光绪帝被抱入宫中，西太后垂帘再举，工程自然因不再需要而停止。十余年过去，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却因国难日深，如影随形，这一点西太后心如烛照。既然仍无力修复圆明园，那便只有重修三海，且如住在距内廷只有咫尺之遥的三海，也可随时知悉光绪帝的举动。于是，在中法战争刚刚结束的光绪十一年五月初八日（1885年6月20日）下达懿旨宣布：“南北海应修工程，著御前大臣、军机大臣、奉宸苑会同醇亲王踏勘修饰。”自此，三海大修工程又重

光

绪



新全面展开。

这次工程的范围包括三海的所有殿宇、房屋、道路、河池、假山堤泊、点景花园、电灯铁路、冰床等等共计一百多处，数百个项目。承包商十六家，各种工匠人役每天平均达四、五千人，有时达一万多人。为表示“孝心”，兴工期间，光绪帝多次到南海、北海、紫光阁等处巡视工程。为了给西太后归政后准备颐养之所，清政府上上下下忙了个不亦乐乎！到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，这项工程最后结束的时候，共计用银高达六百万两左右。

对光绪帝来说，自小就接受翁师傅的严格教育（特别是要体察民情的教育。）因此在当时，他一方面已知道国家的困境与艰难，也明白在这种情况下，大兴土木，和历代那些腐朽的执政者，“或耽于安逸，或习于奢侈，纵耳目之娱而忘腹心之位者”，没有多少差别。然而“老佛爷”的说一不二和为所欲为，不仅任何人不敢谏阴，就是为能达成顺利亲政，表示自己的“孝心”，也不得不如此了。或许光绪帝还想不到那么深刻和全面，但他当然希望无论如何，在自己亲政后，能像在北海上溜冰床那样顺利和如意。

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。就在三海工程热火朝天地进行不久，颐和园工程又大张旗鼓地上马了。

颐和园原名清漪园，位于京城西北圆明园之西，是乾隆帝为他的母亲钮祜禄氏庆祝六十大寿而建，历时十五年，耗银四百五十万两。在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英法联军侵入北京，纵火焚烧圆明园的同时，又派马队冲入该园，焚烧了万寿山的“大报恩延寿寺”、“田字殿”、“九百罗汉堂”；后山的“苏州街”上仿江南风光建造的店肆茶楼也焚烧殆尽；万寿山顶的“智慧海”，亦遭到侵略军的摧残。园中数万件珍贵的陈设，同样被掠抢一空。此后二十余年，这座废园已无人驻足。时人王□运有诗云：





玉泉悲咽昆明塞，唯有铜犀守荆棘，  
青芝岫里狐夜啼，绣漪桥下鱼空泣。

道出了被英法侵略者洗劫后清漪园满目疮痍的悲凉景象。

圆明园自然是无力修复。但光绪帝即位后，最先打主意修复清漪园的，却是坚决反对修圆明园的奕譞。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冬，他上疏想重修清漪园，为御史郭从矩谏阻。但此后数年间，奕譞一直念念不忘此事。没有直接资料证明这位“当今天子”的生父，为什么在当时这么热衷修复清漪园，谅也不出为儿子光绪帝打点将来吧。不过，既然西太后总有一天要归政，况且奕譞又明知其深好炫耀游逸。因此不如投其所好，借此表现对这位操纵儿子和自己及全家命运的“皇嫂”的忠心。恰当三海工程重新进行后不久，海军衙门成立，奕譞成了总理海军事务大臣，从而他的这片“微忱”，终于有了借口和施展的机会。光绪十二年八月十六日（1886年9月14日），他上了一通《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》，声称应复旧制，在昆明湖演水操，而该湖殿宇颓圯，应加整修。

对这种“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”的作法，奕譞自己也知道难以瞒人。于是数日后，在他与庆亲王奕劻“深谈时局”时，嘱其转告翁同龢，当谅其苦衷，“益以昆明易勃（渤）海，万寿山换溱阳也”。就是说：表面上是在昆明湖练水军，实际上是借此名义重修清漪园作为西太后“归政”后游憩场所。既然让人“谅解苦衷”，且又冠冕堂皇，自然无人出面谏阻了。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，“醇亲王奕譞与李鸿章商筹南海工程费，拟以创建京师水操学堂为名，借洋款八十万两”。同时，排云殿业已开工。一个半月后，“水操内学堂”于昆明湖畔开学。就这样，这项花费巨资的工程便在心照不宣的情况下紧锣密鼓地兴工开建了。

这两项大工程开建的时刻，清政府已是国敝民贫。

然而西太后自有“办法”。这就是挪用海军经费和卖官鬻

